

【哲学研究】

朱熹《伊洛渊源录》的理学建构*

杨波 翟若男

摘要:朱熹于乾道九年编成的《伊洛渊源录》,是理学史上第一部专门研究理学学派的著作。朱熹在编纂此书过程中,一是广搜博采原始文献,尽载行实可作实录;二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精心编排省察世情;三是师法《史记》叙事传统,以人系事纵横对比,全面客观地反映出以周敦颐、二程、张载等人为代表的北宋理学宗派的学术面貌,用坚实的文献依据奠定了二程在宋代道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伊洛渊源录》对后世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关键词:朱熹;《伊洛渊源录》;理学建构

中图分类号:B24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2)02-0111-04

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及其学术成就一直是历代学者关注的热点。他于乾道九年(1173)编成的《伊洛渊源录》,全面客观地反映北宋理学宗派的学术面貌,用坚实的文献依据奠定了二程在宋代道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在学术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一、朱熹《伊洛渊源录》的编纂特色

从乾道六年为母守丧到淳熙六年(1179)赴南康军任上,朱熹在长达十年的寒泉著述时期,撰写出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学术著作,逐渐建立起宏大的理学体系与经学体系,完成了生平第一次学问思想的总结。^①《伊洛渊源录》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整理并初步完成的。

《伊洛渊源录》共14卷,大致按照事状(或行状、家传等)、年谱、墓志铭、哀词、祭文、墓表、赞、奏状、书信、遗事等顺序排列,以周敦颐为开山之祖,以二程为上继孟子道统的“圣人”,收录了四十余位理学家及其弟子的传记资料。该书严格按照“道统”的标准加以编排,是理学史上第一部专门研究理学

学派的著作,具有鲜明的编纂特色。

一是广搜博采原始文献,尽载行实可作实录。朱熹多次与友人谈及《伊洛渊源录》的成书曲折:“欲作《渊源录》一书,尽载周程以来诸君子行实文字,正苦未有此及永嘉诸人事迹首末,因书士龙(薛季宣),告为托其搜访见寄也”^②、“哀集程门诸公行事,顷年亦为之而未就,今邵武印本所谓《渊源录》者是也。当时編集未就,而为后生传出,致此流布,心甚恨之”^③。尽管是尚未定稿的草本,但朱熹在编纂过程中搜集整理了丰富的人物传记资料,尽量用最原始的史料表明自己的理学观点,自有其独特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被誉为“北宋五子”的周敦颐(卷一)、程颢(卷二、卷三)、程颐(卷四)、邵雍(卷五)、张载(卷六),是宋代理学发展史上贡献较大的人物,也是书中分量较重、着墨较多的核心人物。对于那些没有专门传记资料记载的理学之士,朱熹则专列一卷,设置“程氏门人无记述文字者”^④,著录了曾就学于二程或推崇二程的理学之士,大致考证出王端明、刘承议、林大节、邢尚书等20人的简要生平事迹及资料来源,表现出史家的审

收稿日期:2021-11-22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汤斌年谱长编与文学思想研究”(21BZW110)。

作者简介:杨波,女,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博士(郑州 450002)。

翟若男,女,中国海洋大学硕士研究生(青岛 266100)。

慎态度。

二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精心编排省察世情。朱熹在编纂此书时,并未按照严格统一的体例去编纂,而是在精心编排文献材料的过程中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臧否人物,省察世情。如卷一《濂溪先生》,首列《事状》,只有短短八百余字,却叙述了周敦颐的家世源流、仕宦经历、主要行迹、性情品格、著述影响等,勾勒出濂溪先生传奇的一生及其对二程的学术影响,正面表达朱熹对理学宗师周敦颐治学思想的看法态度。《事状》之后,还附录有“遗事”十四条,分别从伊川先生、河间刘立之、程氏门人、明道先生、王君况、邵伯温、吕本中、邢恕等人的言谈之间或相关记载中,侧面反映出北宋时期社会生活的基本面貌以及同时代人对周敦颐的不同认知和评价。

三是师法《史记》叙事传统,以人系事纵横对比。作为一部人物传记类著作,《伊洛渊源录》继承了司马迁撰写《史记》时所采用的“互现法”叙事传统,将同一人物的不同事迹分散在不同地方来描述,有的放在人物本传中,有的放在相关人物传记中,有的放在同时代人或后人的评价中,这样既做到重点突出,又能够互相补充,较好地避免了同一事件的重复叙述。如在评述北宋理学宗派另一核心人物程颢时,卷四《伊川先生》分别著录了反映程颢生平事迹的《年谱》《祭文》《奏状》以及“遗事”二十一条等文献,从不同角度展示一代理学大家程颢的生平事略和时人对他的推崇品评,体现出“以人系事”“纵横对比”的记述手法。

《伊洛渊源录》编成时,朱熹 44 岁,正处于“由博反约”的积累阶段,他“根株六经,而参观百氏”,“大旨主于格物穷理”^⑤,并不局限于一时一地一家之言。该书重点突出、主次分明的编纂次序,以及采用的编选、注解、辑录、考证等多种治学方法,正是遵循了宋代理学的内在发展轨迹。

二、朱熹《伊洛渊源录》的理学建构

《伊洛渊源录》把北宋理学家的传记资料,编排成以二程为中心的理学谱系,并就各位传主的学术思想进行溯源探流,标志着朱熹建立的理学体系框架初步形成。

一是尊奉周敦颐为理学之正宗。宋代理学能成 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正是由于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等人的交流论辩和深入探究。这几位在当

时和后世都有深远影响的理学家,因其身份、性格、生活环境、学说观点之不同,在理学史上的地位也各有侧重。《伊洛渊源录》卷一内容虽然简短,但视周敦颐为宋学开山之祖的意味非常明确。从宋代理学的发展轨迹来看,周敦颐被后人尊为理学之正宗,与朱熹的大力推尊有很大关系;但从全书的结构布局及征引文献的内容来看,朱熹并未因推尊周敦颐而刻意贬低宋代其他理学家的贡献。书中文献表明,二程年少时曾经受业于周敦颐,后来的成就实由自得;张载之学比较纯正,程颐却说他“有苦心极力之象,而无宽裕温厚(一作和)之气”^⑥,故而后人对其的尊崇不如二程;邵雍之学偏重于数,理学家认为其学说不够正宗。要而言之,“周子以主静立人极,明道易之以主敬,伊川又益之以致知,其学实一脉相承;朱子又谓二程之学,出自濂溪;后人遂尊为理学之正宗焉”^⑦,南宋理学与北宋理学之间有着清晰的传承脉络。

二是确立二程为传承儒家道统的核心人物。从儒家道统的传承来看,明道先生程颢是继孟子之后传承圣人之道的第一人,也是《伊洛渊源录》着墨最多的灵魂人物,其理学思想堪称北宋理学宗派的总纲领。朱熹用整整两卷内容为程颢立传,对程颢的学术经历、学术观点、文章道德等进行了相对客观而公允的评价。卷二首先著录了伊川先生程颐所撰《行状》,详述了程颢的主要生平行迹、家世背景、为人处世、为学求道、治学路径之大概。录之如下:

先生行己,内主于敬,而行之以恕。见善若出诸己,不欲弗施于人。居广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动有常。先生为学,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⑧

这里所说的“内主于敬,而行之以恕”,正是程颢对儒家道统的理解。程颢主张“明于庶物,察于人伦”,以兴起斯文为己任,最终实现了“辨异端似是之非,开百代未明之惑”的人生理想。^⑨在为人处世方面,“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贤愚皆获其益,如群饮于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于知止,诚意至于平天下,洒扫应对至于穷理尽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学者舍近而趋远,处下而窥高,所以轻自大而卒无得也”^⑩。从“致知”到“知止”,从“诚意”到“平天下”,从“洒扫应对”到“穷理尽性”,这些内容

反映了事物发展变化的不同阶段和不同境界,也反映出朱熹对这些现象的心理认同。

程颢与程颐是一起成长的兄弟和一起求学的伙伴,更是一起问道的同志。程颢去世后,程颐亲自“状其行以求志铭,且备异日史氏采录”,认为“其所以推尊称美之意,人各用其所知,盖不同也;而以为孟子而后,传圣人之道者,一人而已,是则同。文多不能尽取,取其有补于行状之不及者数篇,附于行状之后”^⑫。对程颢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其是孟子之后“传圣人之道”的唯一传人。程颐去世后,他昔日的“门人高弟,多已先亡,无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而程颐生前曾经告诉张绎说,“我昔状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盖与明道同,异时欲知我者,求之于此文可也”,表明他的理学主张与明道先生是一致的。^⑬作为兄长的程颢,对兄弟二人的治学方法和学术贡献有着清醒的认识,并做出过客观中肯的评价,认为“异日能使人尊严师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后学,随人材而成就之,则予不得让焉”^⑭。在上述材料的采录及铺排过程中,可以看出朱熹对二程先生“道统”思想的领悟与思考。

三是肯定邵雍、张载、杨时、胡安国等人的学术贡献。如卷五《康节先生》记载,程颢在康节先生邵雍墓志铭中写道,邵雍之学远有端绪,“先生得之于李挺之,挺之得之于穆伯长”,但论及其学术的“纯一不杂,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至于“其与人言,必依于孝弟忠信,乐道人之善,而未尝及其恶。故贤者悦其德,不贤者服其化,所以厚风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对邵雍的文化贡献给予非常高的评价。^⑮朱熹在同书同卷还收录了《程氏遗书》中关于二程与邵雍交往的记载,称“颢接人多矣,不杂者三人,张子厚、邵尧夫、司马君实”,对张载、邵雍和司马光三人的学问纯粹不杂非常推崇;又如程颢有“尧夫放旷”“风流人豪”“豪杰之士”之语,但认为其学说犹如空中楼阁,“根本不贴贴地”,所以戏称其为“乱世之奸雄中道学之有所得者”,从中可见几个人之间相识相知的深情厚谊。^⑯

朱熹编纂整理的文化典籍非常丰富,其中多有影响深远之作。如果说《太极图说解》和《程氏外书》是朱熹对周敦颐和二程学说的深度解读,那么《伊洛渊源录》《近思录》等则反映出其对宋代理学家学术贡献的客观展示,两者相辅相成,成为解读中年朱熹初步构建理学体系时不可或缺的载体。

三、朱熹《伊洛渊源录》的学术影响

吕思勉《理学纲要》认为:“宋学家为后人所尊者,莫如朱子。朱子于学,最宗濂溪及二程。然于其余诸家,亦皆加以研究评论。至其哲学思想,则未有出于周、张、二程之外者。不过研究更为入细,发挥更为透辟耳。故朱子非宋学之创造家,而宋学之集成者也。”^⑰《伊洛渊源录》的编纂过程也体现出这一倾向,并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是引发了后世关于道学宗派和道学门户之争。如卷六《横渠先生》关于张载生平的记述及身故后亲朋好友对其谥号的争论,反映出宋代学界对如何遵循古礼的不同认知。张载推崇“先王之遗法”,“慨然有意三代之治”^⑱,谒告西归后居横渠故居,日常生活就是读书、沉思、著述,颇有颜回的精神境界,这也正与其“多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学必如圣人而后已”^⑲的观点相吻合。张载去世后,其亲属门人决定“其治丧礼一用古,以终先生之志”^⑳;司马光在《论谥书》一文中,指出张载“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复三代之礼者也”^㉑,认为“关中诸君欲谥子厚,而不合于古礼,非子厚之志。与其以陈文范(东汉陈寔)、陶靖节(东晋陶渊明)、王文中(隋朝王通)、孟贞曜(唐朝孟郊)为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为比乎”^㉒;还有人认为,“横渠道尽高,言尽醇,自孟子后儒者,都无他见识”^㉓,对其皆推崇备至,但对古礼的理解及践行方式却不尽相同。

二是拉开了续修理学经典著作的序幕。朱熹在编纂典籍的过程中非常重视原始文献的使用,还时时不忘考证材料的出处、真伪,不忘辨析材料的取舍、编排。如《伊洛渊源录》卷三《明道先生》“遗事二十七条”其七记载:

明道昔见上称介甫之学,对曰:“王安石之学不是。”上愕然问曰:“何?”对曰:“臣不敢远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尝读诗,言周公之德云:‘公孙硕虏,赤舄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是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犹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

这段文字后面有一段考证性文字,曰:“见《遗书》。又按:《龟山语录》亦载此语,称周公赤舄几几。圣人盖如此。若安石刚褻自任,恐圣人不然,恐当以《遗书》为正。”^㉔朱熹用以史证经的方法去阐发自己的学术理想,体现出追求历史真实、重视学术实践的史家精神。《伊洛渊源录》的草成,既标志着

朱熹对上一阶段学术研究的总结,也预示着朱熹对新研究领域的拓展。

从淳熙元年至淳熙六年,朱熹先后编订了《论语集注或问》《孟子集注或问》《大学章句或问》《中庸章句或问》《大学辑略》《诗集解》《易传》等,拉开了续修理学经典著作的序幕,在推动儒家著作“四书”经典化的过程中也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中年朱熹虽然调整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但《伊洛渊源录》对后世的影响却从未中断。从后世仿照《伊洛渊源录》的编纂体例引发的续修热潮来看,单是《千顷堂书目》卷一所著录的相关续作,就多达八种,反映出明清时期学界对这类理学著作的传播与接受。

三是成为学案体史书的发轫之作。有学者认为,作为一部专为宋代伊洛学派立传的文献学著作,《伊洛渊源录》汇集了各家碑志传状,记录了各位理学名家的学术传记,又辑录了各位理学家的言行、著述、语录及其他遗事,间或加以编撰者的按语、小注,堪称后世“学案体史书的发端之作”^⑫。钱穆先生认为:“在中国纪传体的正史里,就包括有学者的传记。又如前面讲到过《高僧传》,那就等于佛学家的传记,后来如朱子有《伊洛渊源录》,那就是理学家的传记。”^⑬上述观点充分说明《伊洛渊源录》与后世学案体著作之间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关系。

作为一部专论理学源流的著作,《伊洛渊源录》将人物传记从正史《儒林传》中剥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术史著作,学术人物的去取也不再受正史体例的限制,故而能够相对全面客观地反映某一学派或某一时代的学术面貌,体现出一代理学家的非凡气度,但也引起后世学者的陟罚臧否。正如《四库全书总目·伊洛渊源录提要》所评,“其后《宋史》《道

学》《儒林》诸传,多据此为之。盖宋人谈道学宗派,自此书始;而宋人分道学门户,亦自此书始。厥后声气攀援,转相依附。其君子各执意见,或酿为水火之争;其小人假借因缘,或无所不至”,并列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中关于程颐嫡孙程源“直以伊洛为市”的例子,以及“周密《齐东野语》、《癸辛杂识》所记末派诸人之变幻”等内容,指出有些极端人士“或因是并议此书,是又以噎而废食矣”,认为“朱子著书之意,则固以前言往行矜式后人,未尝逆料及是。儒以诗礼发冢,非诗礼之罪也”,其评价相对比较客观公允。^⑭朱熹和他的《伊洛渊源录》,必将因其对儒学的不朽贡献,在河洛文化研究和理学研究史上继续绽放出理性之花。

注释

- ①关于朱熹寒泉著述时期的划分,参见束景南:《朱熹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1—82页。②〔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三《答吕伯恭书》,四部丛刊本。③〔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九《答斗南书》,四部丛刊本。④〔宋〕朱熹:《伊洛渊源录》卷十四,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影印版,第139页。凡所征引,均出于此。下文不一一赘述。⑤〔清〕永瑆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九二,中华书局,1965年,第780页。⑥⑬⑱⑲⑳㉑㉒㉓《伊洛渊源录》卷六,第59、56、55、57、57、57、58页。⑦吕思勉:《理学纲要》篇三《理学源流派别》,上海书店影印本,1988年,第27页。⑧⑨⑩⑪⑫《伊洛渊源录》卷二,第12、12、12—13、13、13页。⑬⑭《伊洛渊源录》卷四,第36、35页。⑮⑯《伊洛渊源录》卷五,第46、48页。⑰吕思勉:《理学纲要》篇八《晦庵之学》,上海书店影印本,1988年,第94页。⑱《伊洛渊源录》卷三,第24页。⑲周春健:《〈伊洛渊源录〉与学案体》,《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⑳钱穆:《中国史学名著》,三联书店,2000年,第244页。㉑〔清〕永瑆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七,中华书局,1965年,第519页。

责任编辑:涵 含

The Neo-confucianism Construction of Zhu Xi's *Iloe' Origins Records*

Yang Bo Zhai Ruonan

Abstract: The book *Iloe' s Origins Records*, compiled by Zhu Xi in the ninth year of Qiandao, was the first work in the history of Neo-confucianism specially studying the Neo-confucianism school. In the process of compiling this book, Zhu Xi first searched extensively and collected the original documents, which could be recorded as facts. Secondly, he distinguished the origin of academic examination and carefully arranged and examined the world situation. Thirdly, he learned from the narrative tradition of the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compared people and things vertically and horizontally, comprehensively and objectively reflected the academic outlook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Neo-confucianism sects represented by Zhou Dunyi, the Cheng Brothers and Zhang Zai, and established the core position of the Cheng Brothers in the Taoist system of the Song Dynasty. *Iloe' s Origins Records* has also had an unignorable impact on later ages.

Key words: Zhu Xi; *Iloe' s Origins Records*; Neo-confucianism construction